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第三期

王仲孚 主編



蘭臺出版社

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印行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山東省荷澤市博物館藏)

蘭臺出版社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編輯部編輯---初版---臺北市：蘭臺，民 92---
冊：公分

ISBN 986-7626-02-8 (第三期：平裝)

1.中國---歷史---上古(公元 2697 年以前---期刊

621.05

90009024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第三期

圖書目錄：LTS003 (03-01)

主 編：王仲孚
編 輯：中國上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 審 者：中國上古史編審委員會
封 面 設 計：黃翠涵
出 版 者：蘭臺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六二六七號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 74 號 4 樓
電話：(02)2331-0535 傳真：(02)2382-6225
劃 撥 戶 名：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帳 號：18995335
E - m a i l：lt5w.lu@msa.hinet.net
網 路 書 店：<http://w.w.w.5w.com.tw>
總 經 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橋和路 112 巷 10 號 2 樓
電話：(02)2249-6108 傳真：(02)2249-6103
香港總代理：文星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 (新科技廣場 10 樓 1020 室)
電話：(852)2789-1736
出 版 日 期：2003 年 6 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 680 元整(平裝)

ISBN：986-7626-02-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 錄

一、論 著

1. 再論文獻史料對於夏史研究的重要性 王仲孚 1
2. 二十世紀夏代考古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李先登 13
3. 我對夏文化的認識－兼談相關的古史問題 鄭 光 21
4. 探索夏文化述要 鄭杰祥 61
5. 關於大禹治水問題的再檢討 羅獨修 67
6. 〈禹貢〉著作時代考辨之回顧與檢討－兼論〈禹貢〉的
史料價值 高上雯 83
7. 〈“新砦期”研究〉增補 顧 問 109

二、轉 載

- 夏商之際夏民族的遷徙 徐中舒 131

三、書 評

1. 評介許宏著《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 石蘭梅 141
2. 評介張立東、任飛編《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
對話》 梁國真 149
3. 評介董琦著《虞夏時期的中原》 王瑞傑 157

四、新 書 介 紹

1. 《登封王城崗與陽城》 165

2. 《偃師二里頭》 166
3. 《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崛起》 167

五、簡介夏代考古與夏文化研究的學者(一)

1. 徐旭生.....秦照芬 169
2. 夏鼐.....王仲孚 170
3. 鄒衡.....劉 緒 172
4. 趙鐵寒.....王仲孚 175

六、附錄

1. 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大事簡記.....秦照芬 177
2. 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參考書目.....王仲孚 181

A SPECIAL ISSUE OF RESEARCH ON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September, 2003/6/30

Table of Contents

I .ARTICLES

1.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ocume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 History Studies Wang Chung-fu 1
2. Retrospect and Forecast for Research of Archaeology of Xia Dynasty of the 20th Century Li Xian-deng 13
3. A View of the Xia Culture—And Talk about the Related Issues of the Ancient History Zheng Kuang 21
4. Brief about Exploration of the Xia Culture Zheng Chien-cheung 61
5. Researching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the Great Yu's Vanished Flood and the Rise of State Lo Tu-hsiu 67
6. The Recol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Written Time of *Yougong*—Als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Yougong* Kao Shang-wen 83
7. Supplement for Study of *Xin Zhai Phase* Gu Wen 109

II .REPRINT

- The Movement of the Xia People between Xia and Shang Zou Heng 131

III .BOOK REVIEWS

1. The Comment on “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Cities in Pre-Qin Period” of Su Hong's Writing Shih Lan-mei 141

- 2.The Comment on “To Expound the Absruse Writing by Archaeological Finds—the dialogue with the Research Fellows of the Xia Culture”
Compiled by Chang Li-dong and Ren Fei Liang Guo-zhen 149
- 3.The Comment o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Yu Period and Xia Dynasty” of Dong Qi’s Writing..... Wang Jui-chieh 157

IV.NEW BOOK INTRODUCTION

1. Wang-Cheng-Gang and Yang-Cheng in Deng-Feng 165
2. Er-li-tou in Yan-Shih..... 166
3. The Rising of the First Dynasty of China..... 167

V.INTRODUCTION OF THE SCHOLARS ABOUT THE STUDIES OF XIA’S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1. Xu Xu-sheng.....Chin Chao-fen 169
2. Xia NaiWang Chung-fu 170
3. Zou Heng Liu Xu 172
4. Zhao Tie-han.....Wang Chung-fu 175

VI.APPENDIX

1. The Chronicle about the Archaeology of Xia Dynast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Xia Culture.....Chin Chao-fen 177
2. A List of Reference Books about the Archaeology of Xia Dynast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Xia Culture.....Wang Chung-fu 181

再論文獻史料對夏史研究的重要性

王 仲 孚 *

提 要

本文重申文獻記載對夏代考古與夏文化的探索的重要性，並認為三十多年來此一工作未能有所突破，主要關鍵是夏文化的考古遺存，未能得到與文獻記載互相印證之故，未來此一工作的進行仍須文獻史料與考古發掘同受重視才行。

關鍵詞：夏文化、夏代考古、夏墟、文獻、二里頭、王城崗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壹

夏代考古與夏文化的探索是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一件盛事。二里頭類型文化遺址與登封告城鎮王城崗遺址的發現與討論，掀起了夏史研究的高潮，吸引著海內外學者的注意。一九九〇年五月在周鴻翔教授籌劃推動下，於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舉辦《夏文化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Xia Culture, May 23-25, 1990），出席者除兩岸和香港學者外，美、英、俄、澳、加、日等國學者多人參加，可說是討論夏文化的一次空前的國際盛會，①筆者在這次會上發表了〈最近三十年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檢討〉。②第二年，即一九九一年八月，由殷商文化學會主辦，在河南省洛陽又舉辦了一次《夏商文化國際研討會》，這次出席會議的各國學者也很多，大會還安排參觀了二里頭遺址，宣讀的論文會後集成了論文集—《夏商文明研究》。③

貳

筆者在洛陽《夏商文化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是〈試論文獻史料對於夏史研究的重要性—兼釋夏〉。④此文強調在確信古史記載的夏朝存在的前提下，如何通過考古的發掘來印證文獻記載的夏朝，應是夏代考古和夏文化探索的首要目標。目前被認為是「夏文化」的考古資料達十一種

① 可惜這次會議結束後，未出版論文集，因此使這次會議的許多論文，未能流傳開來。

② 此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歷史研究所合編《歷史學報》第21期，1993年6月出版，後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1996年12月。

③ 胡厚宣主編：《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共收論文44篇。

④ 收在《夏商文明研究》，頁68-79。

之多，⑤究竟何者是「夏文化」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其所以如此，主要由於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未能取得聯繫之故。所以，未來除了繼續加強考古發掘，文獻本身的研究與探討也不可忽視。⑥

在大會安排討論的時段裏，黃盛璋先生首先發言，對我的看法頗有意見，他認為現在探討夏代與夏文化，當然要依據考古資料，那裏還能依靠文獻。我在回答黃先生的意見時說，我們不要忘記夏代考古和夏文化的探討，主要的目標是想以考古資料印證文獻記載的夏朝。一九五九年徐旭生先生豫西考古的目的就是在尋找夏墟和印證文獻記載的夏朝，徐先生指出夏人活動的兩個地區在晉南和豫西、河南登封告城鎮可能是禹都陽城等重大的指示，都是依據文獻的線索而提出的，⑦而此後成為夏代考古主要的依據。我並請教黃先生，如果完全不必理會文獻資料，那麼夏代考古和夏文化的探索為什麼一定要在河南進行呢？是否也可以在黑龍江、廣東、福建，甚至台灣也找幾個古文化遺址試掘看看呢？我想是不必了。為什麼不必在這些地方尋找夏文化的遺跡呢？豈不是因為沒有任何文獻記載可提供線索嗎？今天河南偃師二里頭、登封告城鎮王城崗、山西夏縣東下馮等遺址受到重視，就是因為這些遺址可以與文獻對照的緣故。

我的答辯結束後，武漢大學的方西生先生起來發言支持我的意見，並說明一九五九年徐旭生豫西考古就是依據文獻的資料而進行的。會後我才

⑤ 這十一種之多的所謂「夏文化」是：1.仰韶文化為夏文化說；2.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說；3.灰陶文化為夏文化說；4.河南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說；5.齊家文化為夏文化說；6.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一期文化為夏文化說；7.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東下馮類型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一、二期為夏文化說；8.二里頭文化一、二、三期為夏文化說；9.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為夏文化說；10.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某個類型與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為夏文化說；11.陶寺類型文化為夏文化說。參鄭杰祥著：《夏史初探》，頁 142-143，中州古籍出版社印行，1988 年 12 月。

⑥ 參《夏商文明研究》，頁 69-70。

⑦ 參徐旭生，〈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考古》1959 年第 11 期，頁 591-600。

知道，方先生是一九五九年追隨徐旭生先生在豫西從事夏代考古的成員。豫西夏墟調查與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揭開了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序幕，這一偉大的成就，是以文獻為依據配合田野考古的收獲而得來的。

參

所謂「文獻」，其範圍不妨擴大解釋，把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以及其他古文字也都可以視為文獻。在甲骨文中似乎並未明顯地發現夏代和夏族的「夏」字，這可能是因為「殷革夏命」，而有所忌諱造成的。但甲骨學者從甲骨文中仍然發現許多有關夏族活動的蛛絲馬跡。徐中舒先生認為甲骨文中有許多羌人的記錄，「羌人就是夏民族的後裔」，「殷革夏命並不是像後來的改朝換代，而是民族間生死存亡的鬥爭，夏民族在這次鬥爭之後，就有一次很大的遷徙……」。⑧朱歧祥先生撰〈說羌－評估甲骨文的羌是夏遺民說〉，「據羌字字形、羌的用法、羌與羌方的關係異同、考古與文獻互較等方面論證，特別是以殷墟玉人的髮飾考訂，追溯當日夏民族在滅族後淪為殷人奴隸的羌人的一真面目。」⑨

在甲骨文裏，有許多征伐土方的記載，郭沫若於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說，「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⑩其後程憬作〈夏民

⑧ 徐中舒，〈夏商之際的歷史與夏商之際夏民族的遷徙〉，《先秦史論稿》，頁43-44，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2年8月。

⑨ 朱歧祥，〈說羌－評估甲骨文的羌是夏遺民說〉，《甲骨文研究》，頁41-48。朱文並指出，夏人入商後的活動，理論上會呈現出以下五點狀況：1.在中原的西、北、南諸方有可能出現夏人的蹤跡，或被驅散和殺戮，或見零散的反抗行動。2.入商後長期並大量的遭受勞役和淪為祭牲。3.成為商人和其他方國共同欺壓和搜捕的對象。4.成為外族納貢於商的貢品。5.商人對夏人的防範，遠比他國為甚。因此在商人的心目中，其地位遠低於諸方國和附庸。因此傾向同意甲骨文的羌為夏遺民說。

⑩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九〈夏禹問題〉，收在《郭沫若全集》歷史篇1，頁309，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族考》，採取了郭氏「土方爲夏民族」之說，^⑪但郭、程二氏並未再繼續運用甲骨文資料加以論證。

一九八九年，胡厚宣先生作〈甲骨文土方爲夏民族考〉一文，^⑫胡氏徵引大量的武丁時代征伐土方的卜辭，確信甲骨文的土方，就是古代的「夏民族」，他並指出武丁以後，征土方的卜辭就較少，則與下列兩條卜辭的內容有關，卜辭說：

貞𠄎大邑於唐土。（《金》611）

己卯卜，爭，貞王作邑帝若，我從之唐。（《乙》570）

胡先生對以上二條卜辭做了如下的解釋和結論：

𠄎之意猶封，作之意為建築。就封疆而言謂之𠄎，就建築而言謂之作。作邑猶言𠄎大邑。帝是上帝，若讀為諾。一辭大意說，貞問若𠄎大邑于唐土好麼？二辭大意說，己卯日占卜，貞人爭問卦，問王要建築城邑上帝允許麼？最後可能認為上帝允許了，乃從命作邑于唐。

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間，翼城一帶。土即土方之土，猶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左傳》昭公元年說，“昔高辛氏（據世本，是為帝嚳）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后帝（杜注堯也）不臧，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大夏，服虔注，“在汾澮之間”，即今翼城之區。大夏即唐土，唐人所居大夏之地，古文獻與卜辭相合。

殷王武丁征伐了土方之后，又在夏民族所居中心唐土一地𠄎建大邑，以監視並鎮壓夏人，可能已見效果。所以

^⑪ 程憬，〈夏民族考〉，《大陸雜誌》1卷5、6期，1932年。

^⑫ 刊於殷墟博物苑、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編《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8月。

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辭就大為減少了。^⑬

胡厚宣先生此文，為以甲骨卜辭探索夏族的史跡，作了很好的示範，此外，曹定云先生從古文字中尋找到夏字的蹤跡，並以之證明夏朝的存在。

^⑭

總之，如將「文獻」的定義做廣義的解釋，則自甲骨文以下的古文字都是探索夏史不可忽視的文獻史料。

肆

實際上，從事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不僅在論證夏代的存在時，要運用古代的文獻，^⑮即討論夏族活動地區，夏王朝的國都、年代、疆域，無一不是以文獻史料作為主要的依據。即使從考古發掘的地下材料討論夏代的器物或建築，也都是徵引文獻材料加以佐證。例如主張夏族分佈於豫西及晉南，主要即以下列的文獻史料作成的判斷：

1. 《逸周書·度邑解》：「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
《史記·周本紀》略同。^⑯
2. 《左傳·定公四年》「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3. 《史記·吳起列傳》：「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

^⑬ 胡厚宣，〈甲骨文土方為夏民族考〉，《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頁6-7。

^⑭ 曹定云，〈古文“夏”字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頁65-75。

^⑮ 趙光賢，〈從古文獻上證明夏代的存在〉，中國先秦史學會、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編：《夏文化研究論集》，1996年9月，頁122-123。

^⑯ 《史記·周本紀》作「居易毋固」。《逸周書·度邑解》之「陽」字當為「易」之訛。參蔡運章、李虹、孟珂，〈「居陽無固」新解〉，《夏文化研究論集》，頁205-206。

至於夏代的國都，文獻記載有十餘個之多，^{①⑦}考古發掘的遺址何者為夏代國都，必須配合文獻史料，才能進行討論。例如推測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夏末的國都，^{①⑧}除了在二里頭遺址發現宮殿遺址等地下材料之外，還須引用《古本竹書紀年》載「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認為河南登封王城崗為禹都陽城，除了王城崗遺址之外，則須引用「禹都陽城」的文獻記載加以佐證，譬如《古本竹書紀年》、《孟子·萬章篇》、《世本》、《史記·夏本紀》、《帝王世紀》、《水經注》、《路史》等大量的文獻。^{①⑨}在有關夏史的著作中，提到有關夏代的疆域大致也是依據上述的文獻史料立論的，^{②⑩}至於夏代的積年，也是主要依據《竹書紀年》、《史記·夏本紀》等書，^{②⑪}就夏代各王在位年數，加以推算而得出來，即使詮釋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似也須配合文獻史料才能彰顯出它的意義來。例如鄒衡先生據《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彝），殷以斚，周以黃目」的記載，認為二里頭晚期出土的器物「封口盃」，就是夏后氏的「雞夷」；^{②⑫}學者對二里頭宮殿遺址的復原，也是與《周禮·考工記》的記載對照，《考工記》稱：

①⑦ 參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1935年。該文依據文獻記載，列舉夏代都邑11個。趙鐵寒，〈夏代諸帝所居考〉，所舉略同，見《古史考述》，台北，正中書局，1965年，頁62-73。

①⑧ 認為偃師二里頭為夏代晚期都邑或桀都斟鄩的學者很多，例如趙芝荃，〈論二里頭遺址為夏代晚期都邑〉，《華夏考古》1987年第2期；方西生，〈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三期遺存與桀都斟鄩〉，《夏文化論文集》，頁81-91。

①⑨ 例如安金槐，〈試論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與夏代陽城〉、〈再論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與夏代陽城〉諸文，收在《安金槐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

②⑩ 例如鄭杰祥《夏史初探》一書中的「夏王朝的興亡」，孫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一書中的「夏王朝的建立」，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一書各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一書中「夏朝概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主要仍以文獻史料為主。

②⑪ 董作賓，〈中國上古史年代〉，《平廬文存》卷一，頁3-4，台北藝文印書館，1963年。

②⑫ 鄒衡，〈試論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147-157。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楊鴻勛先生將二里頭三期大型宮殿遺址加以復原，結合《考工記》「夏后氏世室」記載，認為二里頭宮殿遺址的復原「與文獻所記夏世室的『五室』、『四旁』、『兩夾』、『堂三之二』（堂占進深的 $\frac{2}{3}$ ），『室三之一』（室占進深的 $\frac{1}{3}$ ）的布局情況可以吻合」。^{②③}

從以上的簡述之中不難發現，在「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討論中，沒有文獻史料的配合根本就是無從進行的，文獻史料之不可忽視，也就可見一斑了。

伍

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台北南港舉辦「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學術研討會，筆者發表〈論夏史研究的考古學基礎〉一文，^{②④}當時兩岸學者相聚一堂，氣氛融洽，彼此都很客氣。評論人徐蘋芳先生對本文未作任何不同意的評論。其實我這篇論文雖然不敢把三十年來的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成績一筆抹煞，但對於被認為「夏文化」的考古發掘遺址在論證上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沒有發現夏代文字，因此這些考古遺址不能與文獻印證，因此，我們如果稱「二里頭文化」則無問題，如以二里頭或其他考古遺址為夏代的遺址，則必須得到文獻記載的印證才行，否則就不能隨便冠上「夏」字。目前有關夏史的著作，多仍以文獻史料為敘述的主要內容，附帶提到考古的成績做為推測而已，直到近年為止，這種情形仍未改變。假設我們要以紙上的文獻材料和地下的考

②③ 楊鴻勛，〈初論二里頭宮室的復原問題—兼論「夏后氏世室」形制〉，《建築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④ 王仲孚，〈試論夏史研究的考古學基礎〉，《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四，1997年9月。

古材料撰寫一部夏代史，請問那些地下發掘的考古材料可作為夏代史料，嚴謹一些的考古家恐怕不敢確定吧？

近幾年來夏代的田野考古幾乎近於停滯的狀態，夏史的探討實有待考古與文獻的研究齊頭並進，以求突破。

上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一九九七年七月舉辦的研討會以「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為主題，已透露了這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已得到初步的共識。事實上，中國考古學界已深切體認到，中國的考古學自始就有以歷史研究為己任的取向，而「在歷史研究中，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的基本關係是互補關係」，「研究課題(至少在相當的方面)和文獻史學越來越趨同」，「因此，未來考古學與文獻史學不斷加深的整合中得到發展」^{②⑤}這些主張，不僅為中國考古學的未來發展，指出了寬廣的大道，也為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未來研究時的正確方向。

最後，謹以洛陽會議所提論文中的一段做為本文的結束：

「如果沒有文獻史料作為線索，以中國幅員之廣，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工作勢將無從著手。」「就以夏代考古發掘的許多著名遺址而言，稱之為“二里頭文化”或“二里頭類型文化”、“陶寺文化”、“東下馮文化”等，自無問題，但如冠以“夏代”或“夏文化”，則其遺址的文化內涵應與文獻記載的“夏代”或“夏族”必須取得一些連繫才行，自一九三一年徐中舒先生認為“仰韶文化可能為虞夏民族的遺留”以迄“二里頭文化”四期性質的認定，被推測為“夏文化”的考古資料，先後達十一種之多，其所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就是由於考古資料與文獻史

②⑤ 參：集體討論，趙輝執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中國歷史的重構—為紀念北京大學成立考古專業五十周年而作〉一文，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十三期，2002年6月

料未能取得聯繫的緣故，這一方面顯然有待繼續努力。努力的方向，除了加強考古發掘，文獻本身的探討也不可忽視。」^{②⑥}

^{②⑥} 王仲孚，〈試論文獻史料對於夏史研究的重要性—兼釋夏〉，《夏商文明研究》，頁 69。